Introduction 导言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中国的早期现代化缘起于 1840 年鸦片战争的惨败，面对数千年来未有的变局，清政府被迫开启了中国的现代化历程。出于强国御侮的需要，中国的早期现代化从一开始就具有浓厚的军事色彩。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中，部分清廷官吏认识到了洋枪洋炮的巨大威力，近代武器装备的出现，使部队的编制、编成和训练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也完全改变了中世纪时期短兵相接的战争模式，使近代战争呈现出了与以往截然不同的全新面貌。洋枪队的示范作用使清政府产生了仿效并进而改进清军落后的军事训练的意图。从淮军、湘军大量引进洋枪洋炮开始，中国的军事开始了艰难的现代化历程。

新式武器功能的充分发挥，有赖于普通士兵对武器的精确掌握，即必须具有完善的军事训练。在早期中国的军事改革中，湘淮等军都聘请了一定数量的外籍教习，参与对士兵的基础训练。在海军的创设过程中，为培养基层的操作人员,清政府于 1866 年首先建立了福州船政学堂,培养舰船的修造人才和海军驾驶人才。应当说，在早期的海军教育之中，其着眼点主要在于操作人员的培养，对于近代海战的各种战术指挥思想鲜有涉及。其课程设置除经史之外,其余多是外语、算术、几何、平面三角、微积分、物理、力学、机械图说、航海理论、航海天文学等,这些知识确

为一个海员的必备知识，但是作为海军指挥人员来说，仅此显然是不够的。福州船政学堂的教育指导思想、课程设置和教学体制广为洋务派其后所设的各海军学堂仿效沿用。这种教育方式为中国早期的海军建设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保障了晚清政府建立海军所必需的基层人才。此外，这一时期清政府还于 19 世纪 80 年代创建了中国第一所陆军军事学堂。同时也派遣了中国近代第一批海、陆军留学生。

在甲午战争中，除单兵军事素质、远距离的炮火压制以及完善及时的后勤保障优于清军外，先进的战略战术成为日本取胜的关键。甲午战争的失败表明，只有良好武器和接受过近代军事训练的士兵对于一支现代化军队来说还是远远不够的。武器的不断改进，使近代军队不断向多兵种合成化作战方向跃进。各个兵种之间的协调和指挥，成为影响战争胜负的一个重要方面。这赋予了军事指挥官更为重要的职责，对军事教育的内容和方式也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具有能够理解并准确实施现代战略战术思想的指挥人员，已成为一支近代军队的必然要求。

甲午战争之后，中国的军事改革走上了新的道路，军事教育得到了更多的重视。各种军事学堂纷纷建立，其课程设置和教学体制也更切合实际。随着新建陆军和自强军的编练，经过学堂教育的新式军官供不应求，其作用和价值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反过来又促进了晚清军事教育的发展。在经过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之后，在整个社会强烈的变法图强氛围下，中国的军事教育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各省纷纷建立军事学堂,不仅数量增加,种类和范围也均在扩大。其后，清政府的军事建设步伐逐渐加快， 1903

年设立练兵处，成为主管全国新军编练和教育的行政管理机构。

1904 年,练兵处正式颁布了《陆军学堂办法》20 条,统一了全国军事教育体制；1906 年 4 月,清廷又公布了 10 年内在全国组建 36镇新军的庞大练兵计划。这些措施促使中国早期的军事教育逐渐步入正轨，大大推动了中国军事教育的发展。

中国早期军事改革的每一方面无不与西方列强息息相关。军事教育同样如此，在早期的军事教育部门之中，大都大量聘请外籍教习。他们广泛地参与了中国的军事教育改革，一方面给中国带来了先进的近代知识和军事理论；但另一方面，也加强了中国军事部门对西方的依赖。此外，西方列强为了达到影响中国军事教育，进而控制中国军事改革，实现其侵略中国的目的，对中国军事教育改革的渗透不遗余力，为此，德、日、俄等国展开了激烈的竞争。

早期的军事学堂是近代中国第一批引入西方近代知识体系的学校，这使西方先进文化得以在中国逐渐传播起来。军事教育现代化是中国整个教育体系现代化的开端，它所培养的人才也并不仅仅局限于军事部门之中，而是广泛渗透到文化、教育、科研等各个领域，成为宣传西方近代知识，促进中国民众觉醒的中坚力量。新的军事教育的发展，使中国摒弃了长期“重文轻武”的落后思想,加之 1905 年科举制度的废除，广大知识分子纷纷投笔从戎，“尚武”一时成为社会风潮。早期的军事教育还使西方近代的民族、民主思想深入人心。接受过近代军事教育的新式军官也由此成为推动中国民族、民主

革命的重要力量。

中国的军事教育现代化在中国教育史乃至整个中国现代化史中都占有重要地位，它对于中国晚清的军事进步，社会风气的转变以及民族、民主革命的发展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认真研究这一课题，对于厘清晚清政治、军事史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人”是现代战争中最关键的因素。这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核心之一，也是贯穿当代我军“质量建军”“科技建军”的指导思想。它突出地强调了军事教育在现代战争中的重要作用。这一指导思想的得出也是中国军事教育改革一百多年经验和教训的总结，深入探讨晚清的军事教育改革，对于探索当前中国的科学建军之路仍具有现实意义。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一章

中国近代军事教育的初创

（1866—1894）

第一节 源远流长

——中国古代军事教育的发展

中国军事教育历史悠久。早在夏代，随着奴隶制国家的形成，作为国家机器的军队应运而生，随之便有了军队的军事训练和军事教育。商周时代，军事教育有了新的发展。如周代的学校“教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教六仪，一曰祭祀之容，二曰宾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丧纪之容，五曰军旅之容，六曰车马之容”[1]。其中的“射”、“驭”、“军旅之容”、“车马之容”等显然都是军事教育或与军事有关的内容。这说明早在约两千年前，我国已经有了比较正规的军事教育。

春秋战国，是风云激荡、人才辈出的时代。这一时期涌现出大批杰出的军事家，形成两大社会风气，其一为聚徒讲学，其中不乏聚徒传授军事学说的军事教育家。鬼谷

子可说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他培养出了孙膑、庞涓等著名的军事家。其二为‘养士’之风，特别是战国时期，魏之信陵君、楚之春申君、赵之平原君、齐之孟尝君等四公子‘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秦之吕不韦‘亦招效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2]。各国招纳的‘食客’中，不乏杰出的军事人才，他们相互砥砺，相互探讨，成为军事教育的一种特殊形式。此外，军事家们的军事名著如《孙子兵法》、《吴子》、《六韬》、《司马法》、《孙膑兵法》等，都成为后世军事教育的重要教材。

自秦汉以迄南北朝时代，以官举和九品中正制的方式来举荐选拔人才。其中为培养人才的教育事业非常发达。中央有太学，地方有郡县学，民间有私学。尽管公私教育皆以儒学教育为主，但同时也兼及军事教育。如汉代，刘歆与其父刘向“领校秘书，讲六艺传记，诸子、诗赋、数术、方技，无所不究”[3]。韩延寿‘修治学官，春秋乡射，陈钟鼓管弦，盛升降揖让，及都试讲武，设斧钺旌旗，习射御之事”[4]。正因为有了军事教育，才有了军事人才的举荐。如汉平帝元始二年，“举勇武有节明兵法，郡一人，诣公车”[5]。不惟如此，对已选拔之军事人才和在位军官，也有继续培养和教育的措施，如汉高祖曾下令选拔天下“材力武猛者，以为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常以立秋各讲肄课试，各有员数。平地用车骑，山阻用材官，水泉用楼船”[6]。直至十六国南北朝时代，汉代成法依然沿用，如后赵石勒“令群僚及州郡岁各举秀才、至孝、廉清、贤良、直言、武勇之士各一人’[7]。前秦苻坚时“中外四禁，二卫，四军长上将士皆令受学”[8]。这个时期的军事教育，可以说是由春秋战国时期的无序状态到隋唐以后形成有序的“武举”制

度的过渡。

“武举”制度初创于隋代。炀帝大业三年,下诏以十科举人,其中“才堪将略,则拔之以御侮;膂力骁壮,则任之以爪牙”,以两科选拔军事人才。大业五年夏,诏令四科举人,以“膂力骁壮,超绝等伦”一科选拔军事人才。[9]唐代,武举制度正式确立,以兵部主之;“课试方法”,如举人之制:“取其躯干雄伟,视对详明,有骁勇才艺,及可为帅者。”[10]隋唐之际,烽火连年,战事频仍,军事将帅多从战争中磨砺而出。到唐代中期,宿将纷纷谢世,后继乏人,乃行“制举选将”之制。长安二年,“令天下诸州,有习武艺者,每年准明经进士例举送”[11];“其制有长垛、骑射、步射、平射、筒射,又有马枪、翘关、负重、射材之选”[12]。武举制度的实行,对于推动军事教育的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民间广设塾馆,收徒习武,至有“制为土木马”,“教人习骑者”。[13]

宋承唐制，沿用武举之制，唯法规愈加严密。曾先后制定《武举试法》和《大小使官试弓马艺业出官法》等。宋代武举考试:“始试义、策于秘阁,武艺则试于殿前司,及殿试,则又试骑射及策于廷”,策试“以《孙》、《吴》书为定题”[14]。北宋各帝还常常亲自选拔军事人才，如仁宗于天圣八年(1030 年)“亲试武举十二人,先阅骑射而试之,以策为去留，弓马为高下”[15]。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宋代于武举之外，又设武学，首开国家设立专门军事学校之端。庆历三年(1043 年),仁宗诏置武学于武成王庙,设教授为教官，不久即罢。神宗熙宁五年(1072 年)复置,“生员以百人为额，选文武官知兵者为教授。使臣未参班与门荫，草泽人召京官保任，人才弓马应格，听入学，习诸家兵法，教授纂次历代用兵成败，前世忠义之节是以训者，讲释之。

愿试阵队者，量给兵伍。在学三年，具艺业考试等第推恩，未及格者,逾年再试”[16]。细析之,可知宋代‘武学’已是相当正规的军事学校，其办学方式非常接近近代军事学校。其一,由国家统一招生,经考试后录取,有固定的学制和招生名额 其二,有专门的管理人员和教官 其三,所学课程,有学科(军事理论课)与术科(军事技能),有专业课和政治教育课 其四,合格的毕业生由国家授以官职,不及格者可留级继续学习 最后,特别要指出的是,教育鼓励理论学习与军队建设、战争实践的结合“愿试阵队者,量给兵伍”。除中央武学外,宋代在诸州亦置武学“立《考选升贡法》,仿儒学制,其武艺绝伦,文又优特者,用文士上舍上等法，岁贡释褐；中等仍隶学俟殿试”[17]。也就是说成绩优异者，可直接选拔进入军官队伍。宋代的军事教育，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军事教育的成熟期。

宋代以后经元代而至明代，基本上承袭了宋代的军事教育制度，只是在形式上更加严密、规范。明代洪武二十年(1387 年)开始‘立武学,用试举’戚化年间,仿文科例,设武科乡、会试 弘治年间,先是六年一试,后改三年一试。形成了乡试、会试两级考试制度。崇祯初年，又增加了殿试一场。[18]明代武举考试“先策略,后弓马”[19]“文理优，韬略熟,及射中试者,升二级。文不甚优,射虽偶中,上升一级。虽善行文,射不中试,及射虽中试,策不佳者,俱暂黜以候再试”[20]。与试举制相结合，明代武学亦相当发达“自洪武时置大宁等卫儒学,教武官子弟”[21]。明代武学的发展和形成正规的制度，是在英宗正统年间。正统九年(1444 年),规定‘凡武职官员子弟十岁以上者,都要选送到武学读书，无武学去处即送卫学或州县儒学，教养训

诲 ”。正统十三年(1448 年) 又规定于都指挥以下各级官员除留营掌印者外，其余选取年约在 25 岁以下一二百员与高级军官子弟‘ 俱送武学学习 ”。正统十八年(应为景泰四年即公元 1453 年)又重申前议,无武学者,入卫学、儒学“ 习读武经七书 ’[22]。其中央武学亦始于正统中“ 成国公朱勇奏选骁勇都指挥军官五十一员，熟娴骁射幼官一百员，始命两京建武学以训诲之。……嘉靖中，移京城东武学于皇城西隅废寺，俾大小武官子弟及勋爵新袭者，肄业其中,用文武重臣教学 ’[23]。

直至明代，中国的军事教育都远远走在世界的前列。发达的军事教育体系和完善的军事人才选拔制度使中国杰出的军事人才不断涌现，历代封建王朝均会涌现出一批新的军事家和军事理论著作，这些兵家圣典丰富着中国的军事思想,并不断为中国的军事教育提供着新的教育素材。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二节 日薄西山

——清王朝军事教育的衰落与兵备废弛

明末，生活于白山黑水间的女真族逐渐兴起。为适应战争的需要，清太祖努尔哈赤于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创立八旗制度,规定每 300 人为一牛录，设牛录额真一人,五牛录为一甲喇(队),设甲喇额真(参领)一人,五甲喇为一固山,设固山额真(都统、旗主)一人,副职二人,称左右梅勒额真(副都统)。初建时设四旗:黄旗、白旗、红旗、蓝旗。1614 年,因‘归服益广’将四旗改为正黄、正白、正红、正蓝,并增设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合称八旗,统率满、蒙、汉族军队。八旗是清太祖努尔哈赤创立的一种兼有政治、经济、社会等职能的军事组织。至皇太极即位后，为扩大兵源，在满洲八旗的基础上又创建了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其编制与满洲八旗相同。满、蒙、汉八旗,共 24 旗构成了清代八旗制度的整体。

清军入关后其主力八旗部队的兵力仅有 20 余万,且

有大半驻守在北京，清廷为了弥补八旗兵力的不足，加强在全国的统治，开始招募汉军并将明朝降军进行改编，以营为单位,以绿旗为帜,称为绿营,分为马兵、战兵、守兵、水师四种，分驻于北京和各省。绿营兵制建立后，经过数次改良，至康熙帝时已相当严密。清王朝对绿营兵制有极严格的规定 第一,绿营兵的军政权统一归于兵部,以便将指挥大权集中在中央 第二,军队节制权和局部调遣权‘ 分寄 ’于各地督抚,以防‘ 悍将跋扈 ” 第三,如有事起,皇帝还要临时派钦差大臣统辖，以利于统一调度。这就形成了一个由兵部、督抚、钦差、提镇等相互牵制的复杂的控制系统，使武将无法拥兵自重，从而把绿营兵权高度集中于皇帝手中。[24]

满清统治者以少数民族之地位，凭借武力取代明朝,问鼎中原,因此,在开国之初,高度重视军力的维持。清初，清统治者对军队的军事教育十分重视，规定京师驻军‘ 每月分期习骑射二次,习步射四次 ”,骁骑营‘ 每月分期习射六次 ”。[25]在满、蒙贵族之中，尚武之风尤盛。顺治二年(1645 年),清廷首设‘ 宗学 ”,令王公大臣子弟入学，“ 设教习等官，……使宗室子弟咸涵泳于礼义道德之途，讲明于伦纪纲常之大，服习于书射翻译之业，练习乎文事武功之备 ’[26]。对宗室子弟推行文武并重的教育方针。雍正二年，“ 复定宗室官学之制，左右两翼官房，每翼各立一满学、一汉学 ”，令宗室子弟 18 岁以下者入学“ 兼习骑射 ”,同时规定在每学之中,设‘ 骑射教习二人，选罢闲官及护军校、护军善骑射者充补 ”。[27]雍正七年,清廷为扩大教育范围,又规定各旗设立‘ 义学 ”,每学中亦设“ 骑射教习一人，以本旗善射者充补 ’[28]。各官学

皆以 5 年为期，期满经考试取前两等录用，第三等仍留校肄业。其考试分 3 日进行，头日考汉文四书，第二日考翻译、满文抄录，第三日考骑射、步射。

此外，清袭明制，仍采用武举制度选取军事人才。顺治二年，清廷重开武举，其考试内容为骑射、步射、策、论等。除武举之外，清政府还别开门径，选拔、培养军事人才。雍正九年，清廷谕令各省督抚“于所属地方，招募拣选人才壮健技勇可观者百余人，咨送兵部奏闻，……拣派官员训练教习，以备军旅之用。武生、童生及乡勇、民壮等俱可入选”[29]。雍正十年又令：“向因落第武举，其中不无才力可用之人，是以令本省督抚提镇秉公考验，将年力精壮、弓马可观者留营，给予额外马粮一分，会其差操学习，俾得熟练营伍，以备将来将弁之用”[30]。这种办法“已具武备学校之雏形”[31]。

为检验部队的训练情况，清朝还定有皇帝阅兵的“大阅”制度。其制始于天聪七年，至顺治十六年，定三年一大阅之制，或演阵法，或阅官兵数目及营伍器械。这些措施对清初军事力量的维持都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八旗、绿营外御强敌，内平叛乱，为清王朝统治的稳固立下了汗马功劳，至康、乾时，兵势之强，已达顶峰。然康、雍、乾三朝，虽是清代鼎盛时期，亦是衰败之始，各种腐败之风盛行，并不断侵蚀着军队的肌体，使八旗、绿营先后走向衰败。

首先，在清军的指挥体系上存在着极大的弊端，如前述，清政府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将军队的管理节制权分寄于督抚，兵政、军需权统归于兵部和户部，军令权和最高指挥权则操于皇帝之手。绿营的将官由兵部直接管理，将官

不能直接统兵，只到战时临时拨给部队，而统兵之将多由文官担任，以文制武。绿营兵制虽然很好地防止了武将专权，但由于将不知兵，兵不知将，遇到战时临时抽调成军，导致上下互不相习,号令不一,各自为战,败不相救。与此同时,由于清政府实行了以旗制绿、以文制武的政策,使军事指挥系统层次过多,运转不畅,从而造成了相互牵制、军令难行、指挥失灵的局面。

其次，清政府在军事教育和武举选拔中过分强调弓马骑射，致使文武并重的军事教育方针逐渐流于形式。顺治年间,清廷为防止满人汉化,即令宗室子弟只习满书,停习汉书。乾隆七年,清廷下旨强调尚武精神,言道:“我朝崇尚本务，原以弓马清文为重，……向来宗室子弟俱讲究清文,精通骑射。诚恐学习汉文,不免流于汉人浮靡之习”,因此,准许宗室子弟“或有不能学习汉文者,应听其专精武艺”,“与其徒务章句虚文,转至荒废本业,不如娴习武艺之崇实黜浮,储为国家有用之器也”。[32]乾隆十七年,为使宗室子弟专于骑射之术,更准许其“不必籍举业以入仕”,如有学问优长者“自加施恩录用”。在武举之中,同样如此,外场骑射重于内场策论,嘉庆年间,更将内场考试改为默写《武经》百余字。内场的流于形式,致使考生只重技艺,而忽视军事理论的学习,其中试者中甚至不乏目不识丁之人。[33]由此所选拔出的将弁之才,其素质可想而知。

第三,八旗承平日久,锐气尽失。满清入关后,八旗兵坐享特权,过起养尊处优的寄生生活,昔日剽悍粗犷、骁勇善战之风逐渐荡然无存。八旗官兵的待遇，原本十分优厚。但由于后来生齿日繁，产生了严重的“八旗生计”问题，使清政府不得不用扩大旗兵兵额的办法来弥补，致使

八旗日益成为一个救济机构，选拔兵丁时不是专门挑选体壮艺精者，而是优先考虑生活困难者，旗兵素质出现恶性循环。随着承平日久,八旗军队的战斗力逐渐衰退。早在顺治十四年,顺治帝就曾慨叹“八旗人民怠于武事,遂至军旅隳敝，不及曩时”[34]。1673—1681 年（康熙十二年至二十年),平定“三藩之乱”时,成军不满 60 年的八旗兵在前线“观望逗留,不思振旅踊进”,完全丧失了当年驰骋疆场,奋勇争先的锐气,致使平乱全赖绿营之力;“旗人逐渐退化成卫戍部队”。[35]到嘉庆十七年时，八旗连三年一次的大阅也不举行了。自 18 世纪中期后,“八旗部队就不再是帝国部队的主力，而只是作为征服者的一种标记继续存在着，它已经不再是可靠的实力保障”[36]。

第四，绿营腐化严重，战斗力下降。清廷俸饷制度厚八旗而薄绿营，绿营武官的俸银低于同级八旗武官 1～4 倍,致使绿营将领中“剋扣”、“冒饷”之风盛行,往往出现“册上有兵,伍内无兵,纸上有饷,军内无饷”[37]的现象,从而造成了兵员上的严重缺额。而绿营官兵由于待遇菲薄，入不敷出，部分兵丁只得兼做手艺、商贩以养家糊口。此外,绿营兵平时“差”、“操”混同,百役并举,担负护饷、押犯、缉捕、守护、察奸、缉私、承催等繁重的差务,忙碌不堪。一方面根本无暇顾及军事训练,另一方面,钻营、取巧、油滑、偷惰的“绿营习气”却暗滋潜长。曾国藩论道:“漳、泉悍卒,以千百计械为常 黔蜀冗兵,以勾结盗贼为业 其他吸食鸦片、聚开赌场,各省皆然”。军队里,“无事则游手恣睢,有事则雇无赖之人代充,见贼则望风奔溃,贼去则杀民以邀功”者比比皆是。[38]于是“钻营、奉迎、取巧、油滑、偷惰、剋扣、冒饷、窝娼、庇盗、开赌场、吸鸦片”[39]的现象,便

屡见不鲜了。美国远东问题专家鲍威尔认为：“绿营显然只是一支大型的警备队伍，而不是战斗力量”[40]。

此外，在军事装备上，清军已远远落后于西方。八旗兵始终把弓法、刀技、马术等视为看家本领。绿营兵虽也使用鸟枪、大炮等旧式火器，但由于清政府重弓箭轻火器观念的影响，在明代的基础上毫无发展，坐待落伍。直到鸦片战争前夕，抬枪抬炮对于中国军队来说，仍然是“制胜利器”，清军所使用的自制枪炮，比之英军，整整落后了200余年。[41]

种种迹象表明，清军在鸦片战争之前就早已是军备废弛，纪律荡然。然而，与此同时，工业化却在西方各国迅速发展，在科技和工业的推动下，西方列强的武器装备迅速更新。在陆军方面，滑膛枪和线膛枪、针发枪的先后出现，使步兵武器的射程极大提高，完全改变了以往短兵相接的作战形式。而各种新式火炮的威力更大，火炮的大量装备和使用也使炮兵逐渐脱离出来，演化成为一个独立兵种，并在战争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陆军正日益朝着合成作战的方向发展。在海军方面，蒸汽机已经广泛用于舰船，螺旋桨推进器也已问世并将取代明轮。新式军舰的航速更快，机动性更高。在配备新式火炮之后，近代海军的作战范围和作战效率日益扩大。近代武器的发展，使传统军事思想和军事教育日显落伍，新的军事思想应运而生，进而推动了近代军事体制、军事教育等的巨大变革，近代军事体系在西方逐渐形成。

所有这些变化，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无异于天方夜谭。清政府施行闭关锁国的封闭政策，对外界的飞速发展一无所知。中国虽号称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军事力量，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